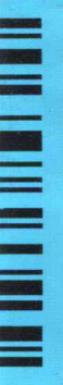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

馆藏3

# 耶稣会士徐日升 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

约瑟夫·塞比斯著



# 耶稣会士徐日升 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

约瑟夫·塞比斯著

王立人译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商务印书馆

1973年·北京

*Joseph Sebes, S. J.*

**THE JESUITS AND THE SINO-RUSSIAN TREATY  
OF NERCHINSK (1689)**

**THE DIARY OF THOMAS PEREIRA, S. J.**

Institutum Historicum S. I.

Rome 1961

**内 部 读 物**

**耶稣会士徐日升  
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

约瑟夫·塞比斯著

王 立 人 译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人民路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8 8<sup>1</sup>/4 印张 200 千字

1973 年 12 月第 1 版 197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17·326 定价：0.77 元

## 出版说明

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导论》为本书作者塞比斯所著，第二部分是徐日升关于尼布楚谈判的日记全文。

本书作者约瑟夫·塞比斯(Joseph Sebes)是一名耶稣会士，自1959年起在美国华盛顿乔治敦大学任职。他将收藏在罗马耶稣会历史研究所图书馆的《徐日升日记》的手抄本译成英文(原文为葡萄牙文)，连同葡萄牙文本在本书中发表，作为本书的第二部分。在这个中译本中，《徐日升日记》是根据塞比斯的英译本转译的。

本书的《导论》概述了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时期沙皇俄国向西伯利亚以至黑龙江流域一带侵略和扩张的过程，中国明、清朝廷对北方疆域的政策以及中、俄之间早期的一些交往和清军对沙俄侵略者的抗击，从而叙述了订立尼布楚条约前一段时期的历史情况。这些材料对于了解早期中俄关系史和阅读《徐日升日记》本文是有帮助的。由于作者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不可能正确阐述历史，甚至有些史实被歪曲；另外，对耶稣会士在历史上的“功绩”及徐日升在尼布楚谈判中的作用，都有过分夸张的地方。读者在阅读时请注意加以分析。

耶稣会士徐日升，葡萄牙人，原名托马斯·贝瑞拉(Thomas Pereira)(1645—1708年)，1666年当他二十一岁时被派往印度传教，不久就转到中国澳门，1673年受聘为康熙帝的音乐教师来到北京，从此定居于北京。1689年康熙帝派他和另一名耶稣会士法国人张诚(原名 Francis Gerbillon)以译员身分随同由索额图率领的代表团前往尼布楚参加与沙皇俄国的划界谈判。1690年1月，徐日升写了一份向教会汇报此次谈判经过情况的报告。此报告以

日记体写成，因而称为《徐日升神甫的日记》。这部日记对于这次谈判的经过情况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虽然其中对于他本人在这次谈判中所起的作用有过分夸大的地方，但仍不失为一份记载这一历史事件的细节的素材，对于了解签订尼布楚条约的史实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原书《导论》中的第九章主要是讲解徐日升日记葡萄牙文本排印的体例的，因中译本不刊载葡萄牙文本，故略去。书中的注释附于各章的后面。原书中有一些注释只是罗列了一些名词的不同的外文拼写形式，在翻译过程中已加以删略。

1973年9月

1. 1973年9月1日 星期一  
晴 11时 意大利语  
as soon as I awoke this morning I got up and dressed. At 11 o'clock I went to the church to say my Mass. After Mass I went to the hotel to have breakfast. At 12 o'clock I went to 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 Consulate to see Mr. Li, the Consul. He told me that he had received a telegram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sking him to go to Moscow to discuss the Sino-Soviet border question. He said that he would go to Moscow on September 15th. I asked him if he could give me some information about the border question. He said that he would give me some information when he returned from Moscow. I asked him if he could give me some information about the border question. He said that he would give me some information when he returned from Moscow.

# 目 录

前言	1
徐日升神甫日记导论	5
第一章 俄国的向东扩张	6
俄国扩张的特点	6
海岸   河流系统   黑貂皮   私人事业	
早期的试验	7
伐来几亚人和诺夫哥罗德人   莫斯科人	
侵入西伯利亚的成功	9
斯特罗哥诺夫家族   西比尔   耶尔马克   扩张的方式	
俄国在西伯利亚扩张的各阶段	13
鄂毕河流域   叶尼塞河流域   勒拿河流域	
黑龙江流域的被侵入	18
从雅库次克派出的远征队   自叶尼塞斯克派出的远征队   雅克萨的建城	
策略的改变	26
向东北   向南   向东	
西伯利亚的政府机构和社会状况	28
政府机构   居民   俄国的正教教会   西伯利亚的毛皮贸易	
第二章 中国和“北方地区”的关系	36
中国的传统态度	36
总的原则   中国被“夷狄”完全占领	
明朝的态度	37
明朝的平时军事力量   明朝的战时军事力量   外交关系   明代制度的衰落	

清朝的政策	47
满族势力的崛起	
清朝对俄国人的外交	
<b>第三章 1689年以前中俄之间的使节和军事行动</b>	<b>57</b>
中俄之间的间接接触	57
直接接触的建立	58
俄国派往中国的第一次外交使节	
最初的军事交锋	
继续的关系	60
新的外交使节	
新的军事冲突	
米洛瓦诺夫的出使	
尼古赖的出使	
最后的交锋	66
军事准备	
新的外交措施	
<b>第四章 耶稣会士在早期中俄关系中的利害关系</b>	<b>75</b>
耶稣会士的参与	75
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接触和交通路线	77
希腊罗马时代	
景教派	
中世纪	
葡萄牙人	
陆地上的路线	85
从欧洲到印度	
到中国去的陆路	
穿过西伯利亚的路线	90
南怀仁神甫	
法国和波兰的耶稣会士	
闵明我神甫	
<b>第五章 耶稣会士在尼布楚的作用</b>	<b>103</b>
<b>第六章 尼布楚条约订立以后</b>	<b>122</b>
中国对蒙古人的政策	
中国对黑龙江地区的政策	
俄国的政策	
尼布楚条约订立后的耶稣会士	
<b>第七章 徐日升神甫,他的日记手抄本及关于其内容的泛论</b>	<b>134</b>
徐日升神甫	134
徐日升神甫日记的手抄本	139
葡萄牙文的手抄本	
手抄本的拉丁文译本	
杜宁·施保的译本	

关于日记内容的泛论	143
第八章 日记中所载的条约文本	147
徐日升神甫的日记	155
提纲	156
日记	159
附录一 十七世纪乌拉尔—阿尔泰区的诸民族	233
附录二 汉英人名译名对照表	240
附录三 汉英地名译名对照表	246

## 前　　言

当前全世界的注意力，又再度集中于俄国和中国在外交、商务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关系。各国的首脑、新闻界的代表和一般公众，都想知道这些关系的真正性质。可是，专家们似乎也缺乏这种知识。而且，由于俄国和中国对世界其余部分的目标和政策也同样是令人猜不透的，所以问题就更复杂了。如果说“历史是生活的指导”这句老话有一些道理的话，那么考查一下过去，以求得解决这个谜的线索，就会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我在本书中将试图研究中俄关系的开始阶段。1689年中俄之间签订中国有史以来和一个欧洲国家订立的第一个条约——尼布楚条约，这是两国关系上的一个重要的划时期事件。通过迪·荷尔德神甫所发表的张诚神甫的日记，和通过一些其他著作（这些著作的作者虽则从来没有全部发表但使用了俄国在尼布楚的谈判代表费多罗·阿列克塞维奇·戈洛文的正式报告）学术界知道了尼布楚谈判的内幕。直到目前，这些著作是我们关于这个条约产生经过的知识的唯一来源。可是，张诚的同伴和耶稣会同事葡萄牙人徐日升，也对这一事件写了一本日记，这本日记不但从来没有发表过，而且它的存在甚至直到现在人们还不知道。在本书中，我将发表并翻译这个有趣的重要文件。张诚是法国人，徐日升是葡萄牙人；因此，应该认为他们是这些交涉的中立的观察者。他们都是西方人，看到这两个东方国家之间的这种奇特的外交涉的情况是有些惊讶的。不过，徐日升和这些谈判发生的关系更为密切，他的日记的机密性更大，因此仔细地读一读这本日记可能会为今天

的西方读者了解当前的情况，提供一些启示。即使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给这个本来已难以打破的谜加入了新的复杂因素，然而中国和俄国的谈判者的心緒似乎根本上沒有改变。

在对《徐日升日记》进行叙述和评价之前，我们必须回答在读者脑子里会发生的一些重要问题。对中国和俄国来说都是外国人的这两位耶稣会士，怎么会参与了产生这个条约的谈判，参与了两个非天主教国家间订立这个条约？这两位耶稣会士对条约的订立起了什么作用？他们自己对他们的任务是怎样想的？他们怎样去执行这种任务？在谈判中时常提到的“国际法”，对交涉和条约的订立起了什么作用？为什么编史工作忽略了这个重要事件？两个半世纪多以来，关于这件事沒有人曾写过论文给以充分的研究。

对于这些问题中的一些问题，曾经有过不同的和分歧的回答，而另一些问题则一直沒有答案。在试图回答所有这些问题之前，必须把在巴夫洛夫斯基所称之为“奇异的三方组合”（俄国、中国和耶稣会士）中的三个方面所作的导致尼布楚条约的订立的活动，加以扼要的叙述。因此，本书分为两个部分：提供历史背景的导论和《日记》的葡萄牙文原文及英文译文。

在导论部分，我力图大略地说明，俄国向东扩张的进程，中国对“北方地区”的态度，导致尼布楚谈判的它们之间所发生的冲突和耶稣会士在中俄外交关系中的利益和作用。在这之后，是徐日升的简略传记和对他的日记一些手抄本的技术上的说明，还有一些有关的话是了解这部日记所不可少的细节。关于这个说明历史背景的导论，必须提请读者注意，虽然也用了一些原始资料，但其相当大的部分是根据第二手的资料，因此在我的叙述中不是在每一次使用第二手资料时，都用脚注提到这些作者的姓名和他们的著作名称。这种作法是为了减少脚注和避免使这个第一部分太长，以致把日记本身贬到次要地位，而不是为了否认应该承认的来源。

我在每一章或章的每一节的开头，都指明了所使用的著作和要知道更详细的材料时可以使用和参阅的著作，这样就承认了我得到这些著者和他们的著作的帮助。这种办法也许会被认为是自行其是，然而似乎是必要的，因为它还有一个好处，即可使叙事不致太频繁地被打断，而且也更容易读一些。

第二部分內容是葡萄牙文原文的日记及其英译文，不需要加以特別的说明。只有一点须说明的：脚注是按葡文本而不是按英文本注的。英译文不总是每一句恰恰和葡文本相符，而是有时比葡文本推后几行；因此是有出入的。但是，葡文本既是原始本，似乎应当以它为准。

关于两个附录，也应该说几句。在第一个附录中，正如在全书正文中一样，我对蒙古名字试用现在专家们所用的拼写法。但是，这却不是总能办得到的，因为格雷戈里大学印刷所沒有带有所需要的发音符号的字母。这个缺点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唯一的另一个办法就是在最后的时刻采用完全不同的拼写法来拼写，而时间却不容许。在汉字的附录\*中，我沒有把正文中所遇到的汉字和日本字都列入。人们比较熟悉的朝代、皇帝和他们的年号，以及省名、出名的城市、江河等名称，都未列入。

最后，我必须对所有曾帮助使本书能够出版的人，表示感谢。

1961年10月24日于华盛顿乔治敦大学

---

\* 这个附录对中国读者不适用，未照录，其内容一部分并入本书附录(二)、(三)人名、地名汉译对照表中。——译者



# 徐日升神甫日记 导 论

“徐日升神甫日记”是徐日升神甫在1900年6月26日至1901年1月25日期间写的一本日记。徐日升神甫是天主教徒，他在这本日记中记录了他在北京的见闻和感受。日记内容包括他对北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看法，以及他对天主教信仰的坚持。日记语言流畅，叙述清晰，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徐日升神甫日记”是徐日升神甫在1900年6月26日至1901年1月25日期间写的一本日记。徐日升神甫是天主教徒，他在这本日记中记录了他在北京的见闻和感受。日记内容包括他对北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看法，以及他对天主教信仰的坚持。日记语言流畅，叙述清晰，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 第一章 俄国的向东扩张

## 俄国扩张的特点<sup>1</sup>

俄国在十六、十七世纪中的扩张，其成功证明是持久的。这种扩张和西欧国家——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和荷兰建立帝国的情况截然不同。它是在陆地上的扩张，而不是向海外的扩张；而且，它受到以下四个因素的支配：

**海岸** 虽然俄国的周围有一些海——北面有北冰洋和白海，西北有波罗的海、波的尼亚湾、芬兰湾和利沃尼亚湾，南面有里海、亚速海和黑海——但是，这些海的沿岸适宜作为海港的地点很少。在这些海之中，有一些海一年之中只有几个月可以航行；大多数在彼得一世(即彼得大帝 1689—1725 年)和叶卡特林娜二世(叶卡特林娜大后 1762—1796 年)的时代之前，甚至还不是俄国的永久领土。

**河流系统** 欧亚草原带北部优良的河流系统和各河流〔伯朝拉河、卡马河、鄂毕河、叶尼塞河、勒拿河、阿穆尔河(即黑龙江)以及它们的支流〕之间陆地联运的方便，吸引了对于这种类型的扩张已有经验、而且是素有经验的俄国人。高出海面一千至五千五百英尺的乌拉尔山，和在卡马河—楚索瓦亚河—鄂毕河这一条线上的乌拉尔山的高不过二千英尺的南部山脉，都不是很难越过的。这就便利了俄国的向东扩张，正如欧亚草原带无树林的南部，曾经在十三、十四世纪时有助于蒙古人向西移入欧洲一样。

**黑貂皮** 从很早年代起，黑貂皮和一般毛皮就是俄国贸易的

商品。确实象一位德国作家所说的：“黑貂促成了对西伯利亚的开发和征服，而且用它的皮子也支付了开发和征服的大部分费用。”<sup>2</sup>固然在征服西伯利亚的后来阶段中，农业移植的可能性，还有取得金属宝藏——金、银和宝石——的可能性，给征服西伯利亚添加了很大的吸引力；但是，最初的推动力却是由那些产皮动物身上似乎无穷无尽的富源所提供的。当这些兽类在俄国东北部开始减少的时候，西伯利亚在向人们招呼。正是这种同样的情况导致了不断的向东发展。这也说明了关于征服西伯利亚的另一个独特之点，那就是：这件事完成得很迅速。

私人事业 最初的一批哥萨克人（耶尔马克、科尔佐等）在沙皇看来都不过是一些歹徒，他们与西方探险家不一样，西方探险家的事业都是得到这个或那个政府的赞助的。卡马河流域的斯特罗哥诺夫家族，对这些开路先锋给予了鼓励和帮助，而沙皇只是在他们的成就已很明显之后，才给他们奖赏。沙皇由于忙于应付欧洲的事务，对这件事没有积极的兴趣，而结果证明这倒是有好处的。因为作为一种私人事业，这件事甚至在那些大公爵和历朝的沙皇忙于其他地方的事务的时候，甚至在“多事的时代”（1603—1613年）里，仍能继续进行。

### 早期的试验<sup>3</sup>

在十六世纪耶尔马克入侵时，俄国人对西伯利亚西部不是完全无知的。

伐来几亚人(Varagians) 和诺夫哥罗德人(Novgorodians) 自九世纪以来，伐来几亚人就开辟了东北的扩张路线。继他们之后是诺夫哥罗德人，他们是这些地区的最初的移植者。但是，乌拉尔山的北部山脉造成了一些困难。而且，诺夫哥罗德人在有了一

些进展之后，又碰到新的艰难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称为尤格拉斯<sup>4</sup>的土著的不欢迎的态度。这些土著们不懂为什么他们要向这些新来的人纳贡。1032至1187年间，曾经多次派远征队越过乌拉尔山，但都沒有取得持久的成就。因此，在诺夫哥罗德，对这一块尤格利亚地方的情况，真正知道得很少。蒙古人统治了这片欧亚草原地带后，俄国人对这些地区的探险和开发便停止了。我们知道，有几位俄国大公们曾到过金帐汗国（钦察汗国）在伏尔加河上的首都沙莱、蒙古的喀喇和林和大汗的朝廷。但是，他们到这些地方去，不是作为土著部落的剥削者去的，而是作为蒙古汗的卑恭的臣民，为他们各自的王国求得承认而去的。

莫斯科人 当蒙古在俄国的统治衰落的时候，莫斯科试图重新打开通往乌拉尔的道路。这些新的尝试大都是在1478年诺夫哥罗德被莫斯科打败之后进行的。诺夫哥罗德和莫斯科之间的斗争在1471至1478年间达到了最高峰。这场斗争基本上是一场争夺原料——即毛皮、公路、河道系统和水陆联运站的斗争。伊凡三世（大帝）认识到，这件事对莫斯科来说，就意味着俄国的新发展，即成为帝国，否则就是瓦解。因此，莫斯科人在他们胜利之后，立即重新开辟通往乌拉尔的各条道路。这一新的越过乌拉尔山的尝试是由后来被尊为圣者的斯蒂芬主教来筹备的。他是乌斯提卢格地方的人，他在彼尔姆地区建造了一些教堂和寺院。莫斯科在1465至1483年间进行了这些远征。这些出征活动使莫斯科人同乌拉尔山那边的伏格尔人和乌拉尔—阿尔泰血统的其他土著部落发生了接触，并且开辟了贸易的道路，如果任何私人敢于到这些地区去的话。由于这些在彼尔米亚和尤格利亚新开辟的地区受到萨摩吉人和其他乌拉尔—阿尔泰种的土著部落的骚扰，1499年伊凡三世派了由塞密昂·库尔布斯基亲王率领的一支四千多人的军队去对付他们。这支军队一直推进到鄂毕河，征服了后来称为西伯

利亚的西北部，它的四周就是冰海、乌拉尔山、康达河和鄂毕河。在这次战役之后，伊凡三世自称为“尤格利亚王”，他的儿子巴西尔四世又加上了“鄂毕多利亚和康迪米亚王”的称号。<sup>5</sup>

但是，所有这些远征的结果都是可怀疑的，因为征服的领土既不容易保持，而胜利之后要继续推进也是困难的。这些远征的结果肯定地证明了，要想越过乌拉尔山的北部山脉去和乌拉尔山之外的地区建立联系是徒劳的。还得再过一个世纪，才发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线。在殖民的方式中还得加上另一个因素才能导致成功。在这一事业中，斯特罗哥诺夫家族起了重要的作用。

### 侵入西伯利亚的成功<sup>6</sup>

斯特罗哥诺夫家族 关于斯特罗哥诺夫家族的来源，有着两种不同的说法。根据某些材料，他们是一个蒙古人的后裔，这个蒙古人由于叛国罪而受到囚禁的辱刑。据另外一些材料，他们的祖先是从诺夫哥罗德来的商人。不管真相究竟如何，第一个斯特罗哥诺夫家族的人斯皮里迪昂是一个商人，关于他的情况有着文献的证明。他在德维纳河地区和诺夫哥罗德之间往来旅行，把他的货物出售给汉萨的商人或和他们交换。他的儿子科斯马斯继续他的父亲的生意；科斯马斯的生意接着又由他的儿子陆卡继承。斯特罗哥诺夫家族的命运前途就是由陆卡来决定的。他预见到时代的趋势是莫斯科的兴起。他使自己和莫斯科大公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和莫斯科疏远，同时他和诺夫哥罗德也保持良好的关系。陆卡的儿子菲奥多听从他的父亲的建议，把他的家从德维纳河迁移至威切格达河来，在一个后来绝迹了的称为索耳维切戈德斯克的地方附近安顿下来。菲奥多死前把他的土地分给了他的四个儿子。斯特罗哥诺夫家里年纪最小的，也是最优异的安尼卡继承了